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袁玮蔓 /YUAN Weiman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00350）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摘　要：中德医学关系史是中德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围绕“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和“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的个案研究较多，缺乏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的整体研究；第二，从德国角度探讨中德医学关系发展的研究较多，少有针对中国对其影响的研究；第三，“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极为重要，但这一视角未全面地应用于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为完善我国的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需要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多种史料的搜集、解读与运用，加强学科互动与国际交流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关键词：中德关系史　德国　中医传播　医学扩张　医学交流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There have been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which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re are many case studies around the two topics: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Germany” and “the German medical expansion of Germany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lack of overal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Secondly, most studies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rmany, with few studies focusing on China’s impact on it; influence. Thirdly, the rise of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but this perspective has not yet been ful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whol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German medical relations in China, more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in combining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collecting,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trengthening 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Key Words: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Germany;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expansion; Medical exchanges

中图分类号：K826.2; N09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01.008　CSTR: 32281.14.jdn.2025.01.008

医学作为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在中德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显著地位。无论是医学知识的跨国传递，还是医疗活动在两国的开展，都与同时期的中德关系密切相关。中德医学关系也是当代中德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分别成立于中国的“中德医学协会”（Chinesisch-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Medizin）和德国的“德中医学协会”（Deut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für Medizin）不仅体现了中德之间医学交往的活跃性，也有助于推动两国友好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德国医生在华活动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BSS016）。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3日
作者简介：袁玮蔓（1986–）女，吉林松原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中德关系史、德国医学史。Email: yuanweiman@nankai.edu.cn

系的持续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和探讨中德间的医学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医学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至今还无针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的整体研究，但国内外学界围绕相关问题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已有研究主要以德国为中心围绕两个路径展开：第一，关注中医在德国传播中，德国人对中医的认知、研究与实践等问题；第二，探讨德国医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德国以医学为手段推动其在华扩张。鉴于尚无专文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评述，本文计划从梳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出发，并以此为基础，对应如何探讨和书写中德医学关系史进行思考，以期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

中医海外传播的历史悠久，德国是较早接触到中医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医在德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在国内外学界的研究中，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常被作为中医西传的组成部分进行阐释。[1]-[5]这些研究倾向于把欧洲当作文化整体，缺乏对不同国家的分析。然而，不仅中医本身，欧洲各国的医学发展、文化氛围、政治环境等因素都影响着中医在各国的接受与研究，使中医在各国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特点。所以，专门探讨中医在各国的发展对于深入理解中医西传的历史十分必要。学界关于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历史已有专门研究。虽然相关研究侧重史实介绍，缺少从历史背景出发的深度分析，但中医德传的阶段性特征在已有研究中已较明显。基于中医在德国的传播范围，左言富将其传播过程分为：17–19世纪初，19–20世纪中叶，1950年至今；[6]范延妮则按照传播内容将其划分为：以针灸和中药的传播为主的17–18世纪，以翻译介绍法医学、炼丹术、本草学著述为主的19世纪，和以编译中医经典著作和教材为主的20世纪。[7]虽然二人的划分标准不同，但为我们整体了解中医在德国的传播脉络奠定了基础。

由于相比于中医的基础理论以及中药、推拿等中医疗法，针灸更为德国人熟知，也较早被德国医学工作者实践，所以学界还针对针灸在德国的传播史进行了专门探讨。汉斯–于尔根·阿诺德（Hans-Jürgen Arnold）的专著《针刺术在德国的历史》[8]是探讨针灸在德国历史的首部学术专著。作者从德国的医学发展、社会环境等角度阐释了针刺术在德国的历史。他认为针刺术在德国的传播经历了从报道中的新奇治疗技术（1650–1800）、到没有理论依据的尝试（1800–1850）、再到真正意义上的使用（1950–1970）、最后到当下作为麻醉方法的针刺（1971–）四个时期，并指出，针刺术在德国乃至西方医学中一直不受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中医学理论无法通过西方医学得到解释和检验。此外，虽然一些论文也梳理了针灸在德国的发展脉络，但主要侧重于对当代的探讨。[9]-[11]

除长时段的探讨外，关于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时期展开。

1. 16–18世纪的中医德传

16–18世纪是中医在德国广泛传播的初始阶段，欧洲传教士和海外医生的著述为德国人了解中医创造了条件。沃尔夫冈·米歇尔（Wolfgang Michel）的研究呈现了中医和受中医影响的日本医学在17–18世纪早期德国的传播。[12]他指出，由于来自欧洲的远东观察者没有区分中日医学，且主要从欧洲医学的视角译介中医，所以，在将医学信息传向德国的过程中导致了很多误解，阻碍了中医在德国的后续发展。以米歇尔教授的研究为基础，袁玮蔓进一步探讨了16–18世纪德国人的中医研究，并提出，德国研究者对中药和脉学基本持积极态度，对针灸的态度经历了从好奇推崇到批评拒绝的转变，直到18世纪末，对中医的负面观点在德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13]

还有学者专门关注了针灸、中药在德国的传播。荷兰东印度公司传教士赫尔曼·布绍夫（Hermann Buschoff）首次把灸法作为治疗痛风的有效方法介绍到了欧洲。米歇尔结合欧洲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欧洲医生对布绍夫文稿《足痛风》（*Het Podagra*）的接受为出发点，详细探讨了当时欧洲医学界，其中包括本哈德·威

廉·吉尔弗斯（Bernhard Wilhelm Geilfuß）、马赛厄斯·戈特弗里德·普尔曼（Matthias Gottfried Purmann）、恩格尔贝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ämpfer）等德国医生对灸法的研究和实践。[14] 伊尔格马尔德·穆勒（Irmgard Müller）主要关注了中药在德国的传播，他以“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院刊①为主要史料，研究了17世纪后半叶德国医学界对中药材的研究与实践，并指出，从院刊中的发表来看，18世纪后德国人对中药材的兴趣逐渐下降。[15]

这些研究阐释了16–18世纪的中医德传以德国医学的发展为导向，德国人对中医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积极研究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质疑、甚至否定的转变。不过，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医传入德国后的情况，对于在中医德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以及传播的具体路径等问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在这方面，学界已关注了德国籍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荷兰东印度公司德国医生安德里亚斯·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德国汉学家克里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等人在中医德传中的贡献，[16]–[20]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

2. 19–20世纪初期德国人的中医认知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西方医学发展及中西关系逆转而引发和加剧的欧洲人对中医兴趣的下降和评价的走低，中医在德国传播的第一阶段也宣告结束。19世纪后虽然更多的德国人来到中国，接触到中医，将关于中医的各种信息传递回德国，但德国人对中医的态度已发生转变。因此，德国人对中医的认知构成了学界研究这一时期中医德传的主要内容。

孙立新以19世纪来华德国新教传教士写作的中国报告为基础，分析了这些传教士的中医观点；他以“迷信、猜想和正确的混合物”（Agglomerat von Aberglauben, Vermutung und Richtigem）为标题内容总结了传教士的中医观点，并认为这些观点主要以西方医学为标准。[21] 孙立新的研究部分地展现了19世纪德国人的中医观点。袁玮蔓以19–20世纪初德国海外扩张时期形成的有关中国医疗卫生的德文著述为研究对象，专门探讨了这一时期德国人对中医的观点和书写。[22] 她指出，这一时期德国人对中医基本上持轻视、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德国人关于中医的既有看法和他们与中医的实际接触共同影响了德国人的中医书写。

上述研究不仅探析了19–20世纪初德国人对中医的负面认知及其成因，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汇总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对于德国人关于中医的这些认知及著述对德国和中国的影响以及在中德关系史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索。袁玮蔓通过探讨这一时期来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指出，通过译介活动，中医基础理论、专科疗法、文化传统被引入德国，对德国的中医研究、热带医学、汉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3] 初步尝试了对德国人中医书写影响的思考。

3. 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中医研究

在一战后西方“东方文化热”的背景下，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文化也受到德国人的重视，德国学界再次开启了对中医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德国医生、医学史家许宝德（Franz Hübotter）是德国中医研究的重要人物。汉斯–罗伯特·高德曼（Hanns-Robert Goldmann）以原始档案和口述史料为基础，首次细致梳理了许宝德的生平及其中西医作品；[24] 虽然不是以对许宝德中医著述的分析为主，但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以许宝德的中医作品为中心，学界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李雪涛探讨了作为汉学家的许宝德对中国医学及药物学的研究。[25] 他指出，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既丰富了德国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由于其与中国学界的密切互动反哺到了中国学术界；不过，并没有具

① “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原为1652年成立的“自然科学院”（A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1687年改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第那自然科学院”（Sacri Romani Imperii Academia Caesareo-Leopoldina Naturae Curiosorum），简称“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院刊《日耳曼自然科学院医学–物理学期刊或杂集》（*Miscellanea Curiosa sive Ephemeridium Medico-physicarum Germanicarum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简称《杂集》，自1670年开始出版发行。

体阐释许宝德中医研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刘芳超重点关注了许宝德的中医著述，认为他对中医的关注突破了时代局限性。[26]张雪洋从翻译学角度阐释了许宝德的重要中医学著作，即1929年出版的《中华医学》(*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 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她指出，许宝德虽然在翻译和理解中医方面存在少许偏差，但《中华医学》是20世纪初欧洲最为出色的中医学著作之一，为西方人认知中医奠定了重要基础。[27]

这些研究细致梳理和积极评价了许宝德及其中医贡献，但相比于许宝德，针对这一时期德国中医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威利·哈尔特拿(Willy Hartner)的研究则较少。作为汉学家的哈尔特拿以东方科技史研究见长，并基于大量中外文医学文献写作了“古代中国的治疗术”[28],[29]一文。虽然文树德(Paul Unschuld)、[30]李雪涛[25]等学者都提到过哈尔特拿的中医研究，但尚未展开系统探讨。对哈尔特拿的研究将是对20世纪上半叶德国中医研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医德传问题的思考。

二、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

德国医学进入中国是中德医学关系史的另一侧面，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来华的德国籍传教士；不过传教士的医疗活动以传教为首要目的，不带有扩张德国医学的主观意识。在鸦片战争后德国在华扩张的进程中，医学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范围和影响日益扩大。相比于传教士，在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背景下，19世纪中后期以来德国人在中国展开的医疗活动更带有德国色彩。因此，19–20世纪中叶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构成了德国医学入华及在华发展的主要内容。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沃尔夫冈·埃卡特(Wolfgang Eckart)的著作《1897–1914年间在中国的德国医生——德意志第二帝国中作为文化使命的医疗卫生》[31]是迄今为止探讨这一时期德国在华医学扩张最为全面的研究。该书以丰富的德文原始档案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德国在华扩张时期德国医生推行的医疗卫生措施、医疗传教、医学教育等活动。尽管作者也简述了一战后至1937年间德国在华的医疗活动，不过该书的主体内容局限于一战前。在研究思路上，作者主要强调了医学在德国在华扩张中的工具性作用，缺少对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中德间交往与互动的关注。与这一课题相关的其他研究主要涉及了19–20世纪中叶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某个方面。

1. 医疗传教

基督教传教士是德国在华医疗事业的先行者，之后又有专门的医疗传教士被派往中国，他们在中国展开了大量医疗活动。有关德国在华的医疗传教，在由德国(医疗)传教士以及德国教会编写出版的资料中多有涉及。这些文献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虽然学界缺少对19–20世纪中叶德国在华医疗传教的系统分析，但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德国教会在中国的医疗活动。

很多研究关注了德国在华医疗传教的性质与影响。君特·里德尔(Günther Riedl)梳理了由巴勉会(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在东莞设立的普济医院的历史及以普济医院为中心展开的医疗活动和传教工作，肯定了普济医院医疗救治、医学教育等活动的贡献，并强调“医疗传教不应被用作基督教传教的推动力，而是具有无目的的内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才直接体现了上帝之爱”。[32]李乐曾总结了近代德国传教会在华开办的医疗机构，指出这些医疗机构“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与开放”“消除迷信与愚昧”“缓和了外国传教士与当地居民的关系”。[33]不同于上述积极评价，孙立新以19世纪德国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例，认为这些传教士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体现；医疗作为辅助工具推动了德国在华传教的开展，具有功利主义的目的性。[34]

在以中医为主流的社会中，德国医疗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活动往往进展不顺利，因此，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互动等细节问题也得到了探讨。孔正滔(Thoralf Klein)在关于巴色

会（Basler Mission）在广东传教的研究中指出，要融入当地的医疗环境，医疗传教士不仅要证明西医在某些领域强于中医，还要致力于培养中国助手。[35]瓦尔特·布鲁克豪森（Walter Bruchhausen）较详细地阐述了19世纪晚期巴色会和巴勉会的医疗传教士为在东莞展开医疗传教工作而采取的迎合当地民众的方式：采用中医的某些方法、培训中国助手、贬低中国的医疗卫生和中国西医的医术医德等，突出了殖民扩张时代中德在医学层面的互动关系。[36]细化医疗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接触展现了医疗传教的复杂性，推动了对德国医疗传教及其影响的深入理解。

2. 军事医疗

伴随德国在华武力扩张而来的军事医疗也是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占胶澳”是近代中德关系史中的重要课题，德国在胶澳租借地的军事医疗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很多学者探讨了胶澳总督府的医疗卫生措施及影响。对于德国来说，医疗卫生措施不仅改善了德国驻军的健康状况，[37]还是总督府巩固其统治的工具。[38]在对中国的影响方面，则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黄福得[39]和崔文龙[40]强调，德国在医疗卫生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对当地华人的忽视与歧视；毕能艳（Annette S. Biener）[41]和杨发源[42]认为，德国的医疗卫生活动推动了当地医疗卫生现代化的发展；刘希洋综合了上述两种倾向，在强调德国卫生治理和疫情防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批判了其中存在的缺陷。[43]，[44]

探讨胶澳军医医疗不仅要关注总督府的医疗卫生措施，也要分析这些措施的基础，即其背后的主观动机和心态。因此，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作为胶澳军事医疗直接实施者的海军医生。汉斯–格奥尔格·海尔姆（Hans-Georg Helm）探讨了派驻济南华人医院的德国胶澳军医。[45]他指出，这些德国军医在作为医院医生的同时，还有调查当地医疗状况、密切与政府官员关系、获取当地民众信任、搜集山东省军政信息等任务。在对胶澳军医的分析中，袁玮蔓认为，胶澳军医的医疗实践与写作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医交流，[46]但其与德国的帝国扩张意识密切相关。[47]

可以看到，学界关于德国在胶澳租借地军事医疗的研究已较充分。不过，对于德国在华军事医疗的另一重要组成，即义和团运动时期随德国东亚远征军来华的德国军医的探讨则较少。除关于德国东亚远征军的研究涉及随军来华的德国军医及其活动外，埃卡特对远征军军事医疗构成和发展的探讨，[48]是目前唯一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不过尚缺少对随军而来的德国军医的具体活动及其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3. 医学教育

德国在华的医学教育也是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海德文医工学堂在近代中德文化关系中的显著地位和贡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些学者强调了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积极作用。例如：弗朗索瓦·克雷斯勒（Françoise Kreissler）梳理了从上海德文医工学堂到同济大学的历史。[49]她认为，虽然上海德文医工学堂是德国意图向中国输出其文化的产物，但它在一战后得以延续，因此，应被看作是中德文化领域合作的典范。黄逸在整体探讨1871–1918年德国在华教育问题时，突出了上海德文医工学堂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贡献。[50]

也有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角度分析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研究。例如：罗斯维塔·莱茵波特（Roswitha Reinbothe）反对对德文医工学堂的积极评价，强调其作为德国对华文化政策手段的宣传目的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目标。[51]李乐曾从德国对华政策出发，深度剖析了上海德文医工学堂从建立到发展为同济大学这一历史进程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之间的关联。[52]崔文龙重点展现了学堂德国教师在教学中与中国学生之间的互动，指出了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局限，即“学校能否发挥影响力不仅仅取决于德方的意愿，更取决于中方的接受程度，对于学校的运行和发展，中国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53]

在上述研究中，上海德文医工学堂的作用、

性质、课堂活动等问题已得到阐释。与其相比，关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国立中山大学等也有德国人参与的教育机构中的医学教育，除埃卡特撰写的《1897–1914年间在中国的德国医生》、[31]陈小卡和王斌编著的《中国近代西医缘起与中山大学医科起源》[54]等书给予简略论述外，学界尚未展开系统研究。

三、中国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的影响

可以看到，关于“中医在德国的传播史”和“德国在华的医学扩张”的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了德国人在中德医学关系发展中的主动性作用，例如：论述德国人在中医德传中的作用，德国学界对中医的研究与实践，德国通过医疗活动巩固在华利益、扩大在华扩张等问题。这一研究视角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中，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现代化”等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思维模式长期占据主要地位有关。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立场不同，但“都片面地强调了德国单方面的主观意志和客观作用，忽视了中国与德国对等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中德关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关系”。[55]

近年来，在“全球史”研究的影响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范式，探讨有关跨文化的联系、接触和交往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末以来的一些研究已开始强调，近代中德关系的历史不是单向和统一的，而是动态和复杂的；处于同时代背景下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双方的行动者都带有各自的文化立场、利益诉求或者政治目的；据此，应破除“西方中心论”视角下单向、片面的解读，从互动、微观的视角对近代中德间的各类活动进行探讨。[56]–[59]

受此启发，在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例如：在对德国在华医学扩张的研究中，以各自的研究对象为基础，孔正滔、[35]布鲁克豪森、[36]李乐曾、[52]崔文龙[53]等学者指出，尽管德国在华的医疗活动起源于德国对中国的“冲击”，但德国的“冲击”是有限的，德国在华的医疗活动不是权力单向运作的结果，中国一方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袁玮蔓在探讨19–20世纪初德国人的中医书写时，也强调并分析了德国人与中医的实际接触在其中的作用。[22]这些个案研究初步实践了从中德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中德间的医疗活动，呈现了中德医学关系发展中的交往与互动。

不过，专门从中国方面出发分析中德医学关系史，例如：探讨中国在中医德传中的作用、中国人对德国医学的态度和认知、中国人在德国医学入华及其在华发展中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则较少。葛绿蒂（Lydia Gerber）以德占胶澳时期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在高密建立的诊所为例，探讨了主持高密诊所工作的中国西医如何在诊治当地病人的过程中采取了适合中国人的理念和方法，并成功抵制了德国胶澳军医，即德式“卫生现代性”对诊所工作的干预。[60]刘亮探析了近代中国人对德国殖民当局在胶澳租借地的公共卫生建设经历了从不适应、恐慌到大加赞誉的态度转变，分析了在中国人中围绕胶澳公共卫生形成名不符实建构的原因。[61]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面对德国的医学扩张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同样具有主动性的行为体，是影响中德医学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虽然目前少有关于中国对中德医学关系史影响的研究，但该视角将是对这一研究有意义的补充，对于全面理解中德医学关系史，尤其推动从中德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两国医学的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

四、趋势与展望

通过对与中德医学关系史相关问题研究状况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虽然学界针对中德医学关系史已形成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不过，不仅仍有问题尚待挖掘、很多已有研究也有继续思考的空间；而且还尚未形成对这一关系史的整体探讨。第二，多数研究

从德国角度探讨中德医学关系的发展，少有从中国方面出发、探讨中国对其影响的研究。第三，在“全球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已有从中德互动视角探讨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但还只是个案探讨，该研究视角尚未全面地应用于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针对这些问题，为推动我国的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德医学“关系史”书写，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第一，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面对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一方面，要拓宽研究视角——将个案问题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综合考察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从中德双方的角度、动态地分析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要以宏观角度整合具体问题研究，即以广泛、充分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探析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形成对同类问题或同时段中德医学关系的整体认知，进而更为全面、深入地展现互动性的中德医学关系史。可以说，在深入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具有宏观性的学术视野，是当下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第二，中德医学关系史领域的史料分散且繁复，因此，要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多种史料的搜集、解读与运用是极为必要的。具体来说，要广泛收集各类中外文史料，明晰史料的形成过程，并对其进行综合运用——不仅要系统梳理、阅读官方档案文献，也要对散布于当时报刊文章、研究著作、工作记录、调研报告、日记、书信以及回忆录等各类资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充分搜集和深入解读。在这一过程中，探寻中德医学关系发展的脉络与细节，细致考察隐含在文字中的思想文化因素，以实现对中德医学关系史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的解读。

第三，作为医疗史与中德关系史的结合，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具备跨学科与跨国界的双重特点，因此，加强学科互动与国际交流是推动该研究领域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应推动历史学与医学的学科交流。学界在这方面已有较多成功实践，例如：医学史学术会议的召开、学术期刊的创办、课程的开设等，这些成果和经验为学科互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应加强国际合作。可以看到，在中德医学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而且具有不同于国内的学术视角和问题导向，因此，要积极开展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并加大对国外学术作品的译介。不仅上文提到的米歇尔、埃卡特、孔正涛等德国学者的研究是值得翻译引入的作品，也应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或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医学关系史。了解、引入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的中德医学关系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马伯英、高晞、洪中立.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3, 602–630.

[2] 高晞. 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J］. 中医药文化, 2015, 10（6）: 15–24.

[3] Huard, P., Wong, M. *Chinesische Medizin*［M］. München: Kindler Verlag, 1968, 115–150.

[4] Heise, T. *Chinas Medizin bei Uns. Einführendes Lehrbuch zu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M］. Berlin: Verlag für Wissenschaft und Bildung, 1996, 85–97.

[5] Unschuld, P. U. *Chinesische Medizin*［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7, 99–132.

[6] 左言富. 国外中医药概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192–231.

[7] 范延妮. 中医德国传播考略［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8（5）: 459–462.

[8] Arnold, H. J. *Die Geschichte der Akupunktur in Deutschland*［M］. Heidelberg: Karl F. Haug Verlag, 1976.

[9] 任春梅. 中国针灸在德国的发展［A］, 廖果：东西方医学的反思与前瞻［C］,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100–104.

[10] 李沛、杜野岚、刘梅. 针灸在德国的发展［J］. 中国针灸, 2005,（4）: 275–279.

[11] 李沛、杜野岚、刘梅. 针灸在德国的发展（绪）［J］. 中国针灸, 2005,（5）: 333–336.

[12] Michel, W. 'Far Eastern Medicine in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J］. *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5, 20: 67–82.

[13] 袁玮蔓. 16–18世纪德国的中医研究［J］. 国际汉学, 2021,（4）: 14–20.

[14] Michel, W. *Erste Abhandlung über die Moxibustion in Europa. Das Genau Untersuchte und Auserfundene*

Podagra, Vermittelst Selbst Sicher-Eigenen Genäsung und Erlösenden Hülff-Mittels[M]. Heidelberg: Karl F. Haug Verlag, 1993.

[15] Müller, I. 'Fernöstliche/chinesische Heilpflanzen in den Miscellanea der Leopoldina (1670ff.)'[A], Eberspächer, C., Labisch, A., Li, X. (Eds.) *Wissensaustauch und Modernisierungsprozesse Zwischen Europa, Japan und China*[C], Stuttgart: Wissenschaftliche Verlagsgesellschaft, 2018, 281–311.

[16] 郭金荣. 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 113–117.

[17] Zettl, E. *Johannes Schreck-Terrentius. Wissenschaftler und China-Missionar (1576-1630)*[M]. Konstanz: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Wirtschaft und Gestaltung, 2008, 51–56.

[18] Kraft, E. 'Christian Mentzel, Philippe Couplet, Andreas Cleyer und die Chinesische Medizin. Notizen aus Handschriften des 17. Jahrhunderts'[A], Wormit, H. (Ed.) *Fernöstliche Kultur*[C], Marburg: Elwert, 1975, 158–196.

[19] Rolf, W. 'Christian Mentzel, die Leopoldina und der Ferne Osten'[J]. *Medizinhistorisches Journal*, 1976, 11(1/2): 72–91.

[20] 柯浩德. 交换之物: 大航海时代的商业与科学革命[M]. 徐晓东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2.

[21] Sun, L. *Das Chinabild der Deutschen Protestantischen Missionare des 19. Jahrhunderts. Eine Fallstudie zum Problem Interkultureller Begegnung und Wahrnehmung*[M]. Marburg: Tectum Verlag, 2002, 250–256.

[22] Yuan, W. *Medizin und Kolonialismus. Deutsche Darstellung von Chinesischer Medizin vom Opiumkrieg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20.

[23] 袁玮蔓. 晚清来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及其学术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5）: 268–274.

[24] Goldmann, H. R. 'Franz Hübotter (1881-1967). Ein Berliner Arzt zwischen Ost und West'[D].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1991.

[25] 李雪涛.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7, 39（4）: 60–67.

[26] Liu, F.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Germany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Franz Hübotter'[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21, 4(3): 188–193.

[27] 张雪洋. 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中医研究——以许宝德（Franz Hübotter, 1881–1967）《中华医学》为例[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28] Hartner, W. 'Heilkunde im Alten China'[J]. *Sinica*, 1941, 16: 217–265.

[29] Hartner, W. 'Heilkunde im Alten China'[J]. *Sinica*, 1941, 17: 27–89.

[30] 翁舒德. 德国学者对中国关于自然和人的学问的研究[A], 黄伟明 译, 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等: 德国汉学: 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C],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366–375.

[31] Eckart, W. U. *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 Medizin als Kulturmission im Zweiten Deutschen Kaiserreich*[M].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89.

[32] Riedl, G. *Tungkun. Das Erste Deutsche Missionshospital in China*[M]. Witten: Verlag am Steinberg Gerd May, 1985.

[33] 李乐曾. 近代在中国的德国基督教传教团[J]. 德国研究, 1997,（3）: 24–31.

[34] 孙立新.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J]. 文史哲, 2003,（5）: 40–47.

[35] Klein, T. *Die Basler Mission in Guangdong (Südchina) 1859-1931. Akkulturationsprozesse und Kulturelle Grenzziehungen Zwischen Missionaren, Chinesischen Christen und Lokaler Gesellschaft*[M]. München: Iudicium Verlag, 2002.

[36] Bruchhausen, W. 'Medical Transfer at the Grassroots: Health Care Provision by German-speaking Chritian Missionaries in Souther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A], Ebersprächer, C., Labisch, A., Li, X. (Eds.) *Wissensaustauch und Modernisierungsprozesse Zwischen Europa, Japan und China*[C], Stuttgart: Wissenschaftliche Verlagsgesellschaft, 2018, 215–226.

[37] Schrecker, J. E.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79–83, 214–217.

[38] 余凯思.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M]. 孙立新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299–308.

[39] 黄福得. 1897至1914年间德国在青岛的殖民体制与卫生建设[J].“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2008, 29: 127–159.

[40] 崔文龙. 德国在胶澳租界地建设规划中的卫生措施及对中国人的歧视[J]. 德国研究, 2008,（1）: 63–67.

[41] Biener, A. S. *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Tsingtau in Schantung 1897-1914.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Durch*

Kolonialisierung[M]. Bonn: Motzat, 2001, 257–289.

[42] 杨发源. 1898–1914年间青岛的城市卫生事业[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5）: 157–160.

[43] 刘希洋. 德占时期青岛的医疗卫生治理[J].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2020,（2）: 161–174.

[44] 刘希洋. 卫生防疫与殖民权力: 德占时期青岛的疫情防控[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20,（11）: 30–39.

[45] Helm, H. G. 'Deutsche Marinärzte in Tsinanfu. Eine Kommentierte Quelleneditio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Marinesanitätswesens im Marinepachtgebiet Kiautschou 1904 bis 1914'[D]. Hannover: Medizinische Hochschule Hannover, 1994.

[46] 袁玮蔓. 试析德国军医在青岛及其腹地的医疗实践和科学考察（1897–1914）[J]. 历史教学问题, 2020,（1）: 105–112.

[47] 袁玮蔓. 19–20世纪初期的帝国扩张与医学研究——以德国胶澳军医医学报告为中心的探讨[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1, 43（9）: 1–10.

[48] Eckart, W. U. 'Medizin und Imperialistischer Krieg. Kaiserliche Sanitätstruppen bei der Niederschlagung der "Boxer"-Erhebung (1900-1901)'[A], Hubenstorf, M., Lammel H. U., Münch, R. et al. (Eds.) *Mediz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skritik. Festschrift für Gerhard Baader*[C], Husum: Matthiesen Verlag, 1997, 135–155.

[49] Kreissler, F. 'Deutsch-Chinesische Kooperation im Hochschulwesen: Das Beispiel der Tongji-Universität'[A], Kuo, H., Leutner, M. (Eds.) *Beiträge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C], München: Minerva-Publikation, 1986, 10–32.

[50] Huang, Y. *Der Deutsche Einfluß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 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Ä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M]. Frankfurt am Main [u.a.]: Peter Lang, 1995.

[51] Reinbothe, R. *Kulturexport und Wirtschaft. Deutsche Schulen in China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M].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1992.

[52] 李乐曾.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53] 崔文龙. 同济医工学堂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J]. 史林, 2014,（3）: 69–80.

[54] 陈小卡、王斌. 中国近代西医缘起与中山大学医科起源[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55] 孙立新. 近代中德关系史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40.

[56] Leutner, M. 'Hegemonie und Gleichrangigkeit in Darstellung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A], Leutner, M. (Eds.)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tudien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C], Münster: Lit Verlag, 1996, 447–460.

[57] Leutner, M., Mühlhahn, K. (Eds.)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m 19. Jahrhundert. Mission und Wirtschaft in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C], Münster: LIT Verlag, 2001.

[58] 孙立新、崔文龙. "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J]. 理论学刊, 2011,（1）: 87–95.

[59] 孙立新. 关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考[J]. 史学理论研究, 2017,（1）: 15-19.

[60] Gerber, L. 'Mediating Medicine. Li Benjing, Richard Wilhelm and the Politics of Hygiene in the German Leasehold Kiaochow (1894-1914)'[A], Cho, J. M., Crowe, D. M. (Eds.) *Germany and China.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97–112.

[61] 刘亮. 论近代国人对德租胶澳公共卫生神话的建构[J]. 历史教学问题, 2017,（4）: 23–27.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

JDN